



据1986年统计,我国部分位于山地、高原及其它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农民的劳动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1986年开始,中央和省(自治区)政府进一步强化了扶贫措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贫困地区开始得到更具体、深入的落实,到1989年,贫困地区中65%的贫困农户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30%的农户三年实现了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其中6%左右的农户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开始向“小康”迈进。显然,过去那种在贫困状态下农户收入“均衡”的局面已经被打破,户与户间的收入差异已很明显。为便于探寻产生收入差异的原因和农户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潜力,我们应用多元层次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从家庭人力资源、人口特征、土地资源和生产工具几个方面对影响农户收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特点

本文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和其他21所高校人口研究所1989年底联合进行的中国23个贫困县抽样调查。这23个县分布在6个行政区,22个省。调查采用多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县抽取1000户左右。样本总规模为23340户,97935人。1986年,这些县的人均收入低于200元,其中三分之一的县低于150元,均属贫困县或特贫县。被调查人口中99%持有农村户口,因此也可以说是对贫困县中农民户的调查。

样本具有几个明显特点:(1)在地理分布上,除华东和中南两区分别抽选6个和5个县外,其余4个地区各选中3个县,样本具有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和代表性。(2)样本总量由“贫困户”、“脱贫户”和“富裕户”三类户构成。户类的划分按农户所在县经济开发办公室(扶贫办)所定的标准,具有各县的相对性。调查是以贫困户为主,其它两类户为辅,按5:3:2的比例抽取户样本。(3)高收入农户与低收入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最低的低于100元,最高的达2000元以上。为能更真实地反映样本整体情况,我们将家庭无劳动人口,靠外来资助或儿女赡养的农户和极少数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的农户排除掉。在剩下的23292户中,1989年人均收入均值575元,其中73.6%的农户人均收入低于均值,收入高于均值的农户只占26.4%。

基于以上样本特点,我们以收入均值为中心,采用不等距分层方法,将户人均收入重新分为四个水平,各户按收入水平归入不同“层次”。人均收入低于均值一半(288元)的户属“贫困层”,人均收入在288—575元,576—1150元(均值的两倍)和高于1150元的户分别属“低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高收入层”。贫困与低收入之间的最小差距是287元,与高收入间的差距超过800元,低收入与高收入间的差距至少是575元。按上述分层标准的农户分布是:贫困层35.

1%，低收入层38.5%，中等收入层20.3%，高收入层6.1%。各区域内农户在四个收入层次的分布情况体现了地区间农民的收入差异(参见表1)，平均收入最高的东北地区高收入农户占11.56%，收入最少的西北地区高收入户只占1.79%，前者比后者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低于样本收入均值的农户比重看，西北地区高达88.7%，比东北地区高出25个百分点。由上可见，在分析农户收入差异时必须考虑地区因素的影响。

表1 按六个区域四个收入层次分组的农户分布

行政区	高收入层		中等收入层		低收入层		贫困层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华北	156	5.02	658	21.18	1318	42.43	947	31.36
东北	349	11.56	752	24.91	1053	34.88	865	28.65
华东	416	6.73	1391	22.13	2470	40.37	1846	30.17
中南	360	7.17	1274	25.38	2024	40.32	1362	27.13
西南	100	3.32	365	12.11	973	32.29	1575	52.27
西北	54	1.79	288	9.55	1118	37.08	1555	51.58
总计	1431	6.14	4728	20.30	8956	38.45	8177	35.11

二、模型和方法

在我们的分析中，将家庭户的人均收入作因变量，影响收入的诸因素为自变量。实际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择业路子的拓宽，农户的收入来源日趋广泛，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也更加复杂。我们仅以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按户主特征、家庭人口素质、土地资源和生产工具四个方面，将与收入有关的因素分组，再以不同变量组合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变量说明见附表)。模型1以户主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民族和家庭劳动人口比、劳动力的生产技术及劳务型流动率为自变量，以检验户主特征和家庭人口素质在家庭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程度。模型2重点检验土地资源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自变量由户主特征和农户承包耕地、山林、果园、渔塘两组因素构成。模型3中包括了上述四组18个变量，除测量生产工具在提高农户收入中所起的作用外，还可分析四组变量的综合作用和彼此间的影响。

不等距多层因变量和混合型自变量是我们建立模型的显著特点。另外我们还考虑到我国六大区域间明显的社会、经济、人口差异，设立六个虚拟变量来表示农户是否位于华北、华东、中南、西南或西北。这些虚拟变量用于回归分析时，西北区作为对照标准而被略去。多层因变量模型着眼于对比分析，我们选用收入最低的贫困层为参照组，通过模型建立起高、中、低三个收入层次与贫困层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农户收入差异分析归结为农户在各收入层次间的流动问题。

鉴于分析目的和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特点，我们选用多元分层 logistic 回归过程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令 Y 表示户人均收入，则它的四个值 Y=0, 1, 2, 3 分别代表贫困、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个收入层次。

X 表示长度为 r+1 的自变量向量(r 为自变量个数)，记为： $x=[x_0, x_1, x_2, \dots, x_r]$ ， $x_0=1$ 为常数项。

构造出 Y=0 分别相对于 Y=1, Y=2 和 Y=3 的 logit 函数：

$$g_i(X) = L_n \left[\frac{P(Y=i/X)}{P(Y=0/X)} \right]$$

$$= \beta_{i0} + \beta_{i1}x_1 + \beta_{i2}x_2 + \dots + \beta_{ir}x_r$$

$$= (1X^i)\beta_j, i = 1, 2, 3$$

其中 β_{ij} 是第 i 个 logit 函数中第 j 个变量的系数。在一组因素, 即 X 的作用下, 农户处于各收入层次的条件概率分别是:

$$P(Y = 0/X) = \frac{1}{1 + e^{\beta_1(X)} + e^{\beta_2(X)} + e^{\beta_3(X)}}$$

$$P(Y = 1/X) = \frac{g_1(X)}{1 + e^{\beta_1(X)} + e^{\beta_2(X)} + e^{\beta_3(X)}}$$

$$P(Y = 2/X) = \frac{g_2(X)}{1 + e^{\beta_1(X)} + e^{\beta_2(X)} + e^{\beta_3(X)}}$$

$$P(Y = 3/X) = \frac{g_3(X)}{1 + e^{\beta_1(X)} + e^{\beta_2(X)} + e^{\beta_3(X)}}$$

令 $\Pi_j(X) = P(Y = j/X)$, 对于 $j = 1, 2, 3$ 每个 $\Pi_j(X)$ 都是 $3(r+1)$ 维参数向量 $\beta = (\beta'_1, \beta'_2, \beta'_3)$ 的向量函数。要实现因变量的分层分析, 需要构造出模型的最大似然函数, 首先设立四个虚构变量 Y_0, Y_1, Y_2, Y_3 。 $Y_i = 1 (i = 0, 1, 2, 3)$ 表示农户处于第 i 个收入层次。 Y 与 Y_i 之间的关系是, 若 $Y = 0$, 则 $Y_0 = 1, Y_1 = Y_2 = Y_3 = 0$, 如果 $Y = 1$, 则 $Y_1 = 1, Y_0 = Y_2 = Y_3 = 0$, 依此类推, 无论 Y 取何值, 总有 $\sum Y_i = 1$ 。由此原理构造出的似然函数是:

$$L(\beta) = \prod_{i=1}^n [\Pi_0(X_i)^{y_{i0}} \Pi_1(X_i)^{y_{i1}} \Pi_2(X_i)^{y_{i2}} \Pi_3(X_i)^{y_{i3}}]$$

已知对每个 $i \sum y_{ij} = 1$,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L(\beta) = \sum_{i=1}^n [y_{i1} g_1(X_i) + y_{i2} g_2(X_i) + y_{i3} g_3(X_i) - L_n(1 + e^{\beta_1(X_i)} + e^{\beta_2(X_i)} + e^{\beta_3(X_i)})]$$

求 $L(\beta)$ 关于 $3(r+1)$ 个未知参数的偏微商, 建立起似然方程组, 从中得到估计参数 $\hat{\beta}$ 。在上述过程中, β_{ij} 是第 i 个 logit 函数中第 j 个变量的回归系数, 显然它不能直接说明该变量与因变量 Y 之间的关系。但是可以通过参数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来推断两者的关系是否显著。许多研究证明(参看 Rothman, 1986 年和 Schlesselman, 1982 年的论述), 回归系数 β_j 与农户位于各收入层次的可能性之间有关系式 $\Psi = e^{\beta_j}$, Ψ 为相对于参照层的事件发生比率比(Odds ratio)。由此我们推算出在某个因素作用下, 农户从一个收入层次流向另一收入层次可能性的关系。概括地说, 我们用参数 β 解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说明各因素与农户收入间的关系是否显著, 另一个是推测模型中各因素对农户可能处于某个收入层次的影响程度。

三、结果分析

模型 1 的运行结果表明, 户主特征和家庭人口素质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有很强的统计显著性。它揭示了户主的文化水平、家庭劳动人口比、劳动技能和外出务工经商劳务型流动与家庭收入间的密切关系(参见表 2)。其中家庭劳动人口比和户主的文化水平对收入的影响尤其显著。在高收入层下这两个因素的 Ψ 值分别为 2.11 和 2.02, 说明家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户主的文化水平提高三年, 该农户位于高收入层的可能性是相对位于贫困层的 2.11 和 2.02 倍, 从贫困层到高收入层, 农户的收入翻了两番。可见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 农户收入不仅与劳动力投入成正比, 而且有很强的依赖关系。在大部分农村地区, 户主是家庭经济运行的决策者, 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农民, 容易接受新观念和新技术, 合理选择家庭经济发展途径。劳动技术反映人们从事生产的能力。调查问卷中包括木工、铁匠, 编织、饲养等 13 项技术。具有某种技术的人可

以在从事土地耕种业以外的劳动中获取收入。该因素的参数 β 都具有极高的统计显著性,显示了它与收入间关系极为密切。据调查资料统计,1987—1989年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数仅占劳动力总数的5%左右,模型运行结果仍显示出,劳动力劳务型流动明显影响家庭收入。位于高收入层的农户平均流动人次数是贫困层农户的2.76倍。从对劳动技术和劳务型流动两因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从事粮食生产和简单耕种业的农户收入最低,这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事实,也是发展农村经济急待解决的问题。

表2 模型1运行结果

变量	高收入层		中等收入层		低收入层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年龄	.021** (.003)	1.11	.014*** (.001)	1.07	.006** (.001)	1.03
性别	.607* (.127)	1.83	.406** (.057)	1.50	.092* (.041)	1.10
民族	-.088 (.074)		-.081* (.034)	.92	.260*** (.023)	1.30
文化水平	.234*** (.010)	2.02	.170*** (.004)	1.67	.097*** (.003)	1.34
劳动技术	.952*** (.042)	1.39	.721*** (.024)	1.29	.327*** (.021)	1.12
劳务型流动	.328*** (.017)	1.12	.286*** (.013)	1.11	.178*** (.011)	1.06
劳动人口比	2.310*** (.140)	2.11	1.387*** (.062)	1.62	.934*** (.042)	1.39
未成年孩子	-.150* (.037)	.86	-.123*** (.015)	.88	-.078** (.009)	.92
华北	1.325		1.098		.458	
东北	2.547		1.547		.527	
华东	1.870		1.361		.541	
中南	1.778		1.378		.619	
西南	.441		.077		-.084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小括号中是标准误。

在高收入层,户主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没有显著关系。在户主的民族因素的回归系数中,只有低收入层的 β 是正值且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说明在23个贫困县中,汉族农户处于低收入层的可能性很大,少数民族户获得中等收入的可能性高于汉族户,这两个层次间的收入差距在400元左右。这个结果可能使人产生疑惑,进一步分析得知,在23个县中,1989年农民收入最高的县是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年人均收入829元。其次是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其余4个少数民族县的收入水平基本与汉族人口居住县持平,可见这一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它体现了我国扶贫措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实际效果,也说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内部蕴藏着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

未成年儿童是家庭未来的劳动力,同时也是家庭当前的负担。从模型运行结果中看出,未成年孩子数与家庭收入显著负相关。由于农村地区孩子的生活费用很低,用于抚养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不计经济效益,因而增加孩子数并没有明显减少家庭收入。在高收入层农户中,1989年平均每户有1个未成年孩子,比贫困层农户少0.5个。如果再增加一个孩子,仍然位于高收入

层的可能性只减少14%，与增加一个劳动力后，家庭处于高收入层的可能性增加1倍以上相比，孩子对家庭具有较高的期望效益。这是贫困地区农民愿意早生、多生的原因之一。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基本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水平提高的过程。农户的收入差异也必然与资源利用情况相联系。限于所掌握的资料，我们的分析仅涉及土地资源。在贫困地区，85%左右的劳动人口从事种植业，土地为人类提供了农产品中大部分产品，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模型2的运行结果显示，家庭收入与人均承包耕地显著相关(见表3)，高收入层农户人均承包耕地6.09亩，是贫困层农户的2.65倍，其中有些农户是种粮专业户，他们的高收入部分来自多耕种的土地。然而从高收入层下的 Ψ 值仅为1.02看，对一般农户，人均多种一亩地对家庭收入提高的幅度影响很小。在耕地、山林、果树和渔塘四个因素中，果树对收入的作用最大，每增加一亩果树种植面积，会使农户位于高收入层的可能性上升35%。山林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相对最小，只有高收入层的 β 值在 $p < 0.5$ 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且 Ψ 值只有1.01，说明在1989年的经营水平上，增加山林地承包面积基本未能提高家庭收入。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在23个贫困县中，承包山林开发的农户占比例很小，原因之二是1989年尚处在承包初期，许多开发项目还未产生经济效益。与模型1的运行结果相比，在模型2中，土地资源的作用淡化了户主民族因素的影响，户主的文化水平对收入的作用在两个模型中无明显差异。

表3 模型2运行结果

变量	高收入层		中等收入层		低收入层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年龄	.031***	1.17	.022***	1.12	.011***	1.06
性别	.597*	1.82	.358**	1.43	.051	—
民族	-.018	—	.048	—	.379**	—
文化水平	.201***	1.83	.141***	1.53	.084***	1.29
耕地	.020***	1.02	.006**	1.01	.0003	—
山林	.005*	1.01	-.002	—	.0006	—
果树	.012**	1.35	.010***	1.28	.006*	1.16
渔塘	.286	—	.204*	1.23	-.139*	1.15

注：* $P < .05$ ** $P < .01$ *** $P < .001$

模型3的运行结果显示了四组变量对家庭收入的综合影响。在18个因素中，作用最大的是现代生产工具(参见表4)。在农村地区，拖拉机既是生产工具又可做运输工具，农忙时用于耕作，农闲时用于运输，一年四季都能用它赚取收入，它在高收入层下的 Ψ 值高达14.46，是其它因素 Ψ 值的几倍乃至十几倍，说明拥有拖拉机的农户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是收割机(包括脱粒机)和水泵，它们的回归系数也呈现很高的显著性。在高收入层下的 Ψ 值分别为4.09和2.99，说明它们与收入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对农户收入变动有较强的影响。以上结果均显示，拥有现代农业生产工具是大幅度提高收入的重要条件。

传统生产农具畜力车、手推车和铁犁三因素的模型回归系数不仅都是正值，而且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说明目前在贫困地区还有相当多的农户生产处在“驴拉车、牛耕田”的阶段。对代表农户位于各收入层次可能性的 Ψ 值进行分析，发现畜力车和铁犁两变量的最大 Ψ 值不在高收入层，就是说使用这些农具从事生产的农户实现人均收入超千元(高收入层)的可能性极小。由此得到启示，农户要脱贫致富必须改革传统农具。

表4

模型3运行结果

变量	高收入层		中等收入层		低收入层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参数 β	比率比 ψ
年龄	.035 **	1.19	.024 ***	1.13	.012 ***	1.06
性别	.797 **	2.22	.509 **	1.66	.155 *	1.17
民族	.003		.036		.348 *	1.42
文化水平	.209 ***	1.87	.152 ***	1.58	.088 ***	1.30
劳动技术	.835 ***	1.34	.625 ***	1.24	.267 ***	1.10
劳动型流动	.366 ***	1.14	.317 ***	1.12	.199 ***	1.07
劳动人口比	1.103 ***	1.47	.862 ***	1.35	.601 ***	1.23
耕地	.016 **	1.02	.0004		.003 *	1.00
山林	.007 *	1.01	-.0008		-.0002	
果树	.009 **	1.25	.008 **	1.22	.004	1.11
鱼塘	.121		.171 *	1.19	-.156 *	.86
拖拉机	2.60 ***	14.46	1.954 **	7.06	1.069 ***	2.91
播种机	.398 *	1.49	.193 *	1.21	.063	
收割机	1.409 ***	4.09	1.183 ***	3.26	.771 ***	2.16
水泵	1.295 **	2.99	.951 **	2.59	.237 *	1.27
畜力车	.854 **	2.35	.926 ***	2.52	.557 ***	1.75
手推车	.734 **	2.08	.507 ***	1.66	.321 ***	1.38
铁犁	.725 **	1.08	.169 **	1.18	.149 ***	1.61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对三个模型运行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户主的文化水平和家庭劳动力素质在各模型中对应的 Ψ 值变化很小,说明这些因素对收入的作用基本不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另外还发现,在三个模型中,户主的性别与农户收入间的关系显著,男性为户主的农户人均收入超千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女性为户主的农户。对此我们做如下分析:从家庭结构看,直系三代户占女性为户主农户的70%以上,其余主要是单亲家庭和成年男性户口在外地的两地分居家庭。这些农户的在业人口比平均比男性为户主的农户低0.11,也就是说他们的被抚养人口比例较高;从户主的文化和技术素质看,女性的文化水平比男性平均低2.7年,具有劳动技术的人数比例低8.5个百分点。归根结底,户主的性别对收入的影响,实质上仍然反映了家庭人口素质与收入间的关系。

四、结论

1. 贫困地区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目前他们所占比重还很小,只有6%左右。但年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已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的丰饶程度和开发利用效率,特别是人口素质和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影响着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也制约着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农户收入呈现明显地区差异。在贫困县中,东北地区1986年后富裕起来的农户所占比重最高,分别是华东、华北、西南、西北的1.6倍、2.3倍、3.5倍和6.5倍。

2. 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是实现脱贫、振兴经济的关键。农户的经济行为决定着家庭经济发育速度,劳动者的素质对农户的行为导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生活在同一地区、同样自然条件下和同一政策指导下的农户,那些家庭人口文化素质较高,掌握一定劳动技术,踊跃参与商品经济活动和劳务型流动的,成为科学种田和兼业生产的先行者,他们率先脱离贫困,形成高收入层。当前贫困地区农民的整体素质还比较低,劳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都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要让更多农户富裕起来,必须对他们加强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

3.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是贫困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地资源是农户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的物质基础,几乎农户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的活动。在不少贫困县中,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人均耕地2.5亩以上,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约有73%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基本生活和生产所需都由土地提供。在高收入层农户中,以不同形式直接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致富的占30%以上。当前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土地资源粗放经营,粗放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政策中的不合理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的收入增长。一旦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会有新的飞跃。

4. 发挥山、林资源潜力作用,拓广农户收入来源。在23个贫困县中,山区、半山区县占一半以上,他们中有的拥有铜、铁、金、煤等矿产资源,有的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十分丰富,有的适合种植果树、药材或养殖动物,有的发展旅游事业条件优越。从目前利用情况看,最好的县利用了65%以上,有的利用率还不到30%,而且被利用部分多数是平均承包,将山林地分割成众多小块,影响了开发效益。山林资源是整体系统性很强的资源,只有综合治理、综合开发才能在不破坏山林生态的前提下,较快较高地获得经济效益。

5. 现代农业生产机械的推广使用,加速了脱贫致富的进程。生产工具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高收入层农户中,现代生产机械的平均拥有量是贫困农户的10倍以上。他们具有兼业生产物质条件,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于使用新式农具直接或间接得到的。

6. 冲破传统小农经济束缚,涌入市场经济大潮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从调查分析中不难看出,率先富裕的脱贫农户,不仅本身具有物质优越条件,最主要的是商品经济意识活跃,多数成为兼业劳动者。在不放弃承包耕地的情况下还成了饲养专业户、运输专业户,更多的是抽出家中部分劳力外出务工经商,他们平均收入水平是低收入农户的3倍以上。这些贫困农村先富起来的“大能人”,对广大贫困农户长期保守的小农意识是一种巨大的震撼,中国贫困农民要脱贫致富,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冲破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发挥自己地区的特长和优势,走出自己可路。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附表:变量名称,均值和说明

变量名称	均值	说明
年龄	41.9	户主年龄
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民族		户主民族(汉=1,少数民族=0)
文化水平	4.5	户主受教育年数
劳动技术	0.25	户人口具有劳动技术总数/户劳动人口数
劳务型流动	0.38	1987—1989年户劳动人口外出一月以上人次/户劳动人口数
劳动人口比	0.44	户在业人口/家庭规模
未成年孩子数	1.34	15岁以下孩子
耕地	2.53	人均承包耕地(亩)
山林	1.12	人均承包山林地(亩)
果树	3.38	户均承包果树(棵)
渔塘		是否承包渔塘(是=1,否=0)
拖拉机	0.03	户拥有拖拉机(台)
播种机	0.005	户拥有量(台)
收割机	0.06	户拥有量(台)
水泵	0.01	户拥有量(台)
畜力车	0.14	户拥有量(辆)
手推车	0.16	户拥有量(辆)
铁犁	0.60	户拥有量(部)

(参考文献转第30页)

标。全村76名会员,帮助124户联系户发展高效农业和工副业项目15个。安丘镇小近戈村不仅制定了“小康”和人口目标十年计划,而且每家每户都有详细的奔“小康”和计划生育的具体指标,这就大大激发了全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三、“四带头”“四登门”活动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新的变化

协会会员的“四带头”“四登门”服务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三为主”方针的贯彻落实,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呈现出新的局面。

一是广大群众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广大会员带头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充分发挥了人多势众的优势。目前,安丘县全县由基层协会主办的宣传栏、黑板报有6500多块,永久性固定标语共10000多条,流动宣传版面1500多块,从环境上形成了计划生育势在必行的强大舆论声势。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已基本达到了家喻户晓、成人皆知的程度,还由于婚育科学和优生优育知识的普及,避孕节育措施的全面落实,几千年来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世俗观念,正逐步被新的婚育观所代替。在安丘,实行计划生育已经成为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二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自开展“四带头”“四登门”活动以来,在全县10多万名会员的带头作用下,影响了更多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广大基层协会成为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过去对“难办户”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经济处罚的局面得到了改变。一些对村干部有过抵触情绪的人,经过会员出面疏导,也顺利地落实了节育措施,党群、干群的紧张关系非但有所缓解,而且彼此间更加接近、更加密切了。

三是促进了基层基础工作的开展。随着协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四带头”“四登门”活动的不断深入,一个群众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体系已经形成,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正逐步得到强化。全县在实行计划生育中宣传教育为主代替了单纯的行政经济手段,超前服务代替了只注重抓结扎和流引产,经常化工作为主代替了集中活动“一阵风”。1992年,安丘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流引产手术减少、计划生育率、晚婚率、晚育率提高的新局面。

四是广大会员带头勤劳致富,不断巩固发展了计划生育成果。几年来,安丘县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抓住机遇,组织和动员广大会员积极投身到发展经济中去,带头勤劳致富。到去年底,安丘县已有3000多名会员成为勤劳致富带头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勤劳致富奔小康、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有一万多户。安丘镇的5111名会员中,有的在镇村企业中,有的经营家庭工厂,一般户年均收入都在万元左右。他们富起来后,认为孩子多了是拖累,影响到发展商品经济,都成了本地计划生育的带头户。该县凌河镇郑家河村有一位计生协的理事,早在1986年便带头办起了养鸡厂和冷藏厂,现在已拥有固定资产800多万元。几年来,他除了吸收众多的会员和独生子女户到自己企业里来外,还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本村和邻村120多户育龄夫妇在经济上翻了身。在他的影响下,这一百多户育龄夫妇在生育观念上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安丘县在计划生育实践中总结创立的“四带头”“四登门”工作方法,符合国家推行的计划生育“三为主”工作方针,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上接第37页)

参考文献

- (1)《中国贫困地区人口经济国情资料》,张纯元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
- (2)《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概要》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农业出版社,1988年,6月。
- (3)David·W·Hosmeir, Jr. ;《Applied Logistic Regression》,1990.
- (4)McFadden, Daniel;《Qualitative Response Models》,1982.
- (5)《农村发展经济学》,周志祥,范剑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